

● 中国历史

# 道咸经世派的先驱——严如煜\*

鲁西奇, 罗杜芳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鲁西奇(1965-), 男, 江苏东海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与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 罗杜芳(1976-), 女, 湖南湘潭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摘要] 乾嘉之际, 考据学仍占据思想、学术界之主流地位, 但已有一批学者开始关注经世之学, 他们是道咸经世思想的先驱, 严如煜即为其代表之一。严氏之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为: 以经世致用为著述之主旨; 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 以舆地之学为经世之具; 关心民生疾苦, 探求解决之道。严氏之思想言行, 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特别是魏源、陶澍等人, 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严如煜; 经世致用; 先驱

[中图分类号] K 8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6-0683-08

王国维在《沈乙庵(曾植)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曾论及清代学术的发展, 说:

我朝三百年间, 学术三变: 国初一变也, 乾嘉一变也, 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 天造草昧, 学者多胜国遗老, 离丧乱之后, 志在经世, 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 得其本原, 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 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 纪纲既张, 天下大定, 士大夫得肆意稽古, 不复视为经世之具, 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 涂辙稍变, 言经者及今文, 考史者兼辽金元, 治地理者逮四裔, 务为前人所不为, 虽承乾嘉专门之学, 然亦逆睹世变, 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 乾嘉之学精, 道咸以降之学新<sup>[1]</sup>(观堂集林, 卷23, 第25-26页)。

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亦将清代学术之发展分为三期: 启蒙期、全盛期与蜕分期(衰落期), 分别相当于王国维所说之国(清)初、乾嘉与道(光)咸(丰)以后<sup>[2]</sup>(第1-7页)。所论皆立言乎大, 颇得清代学术发展之大要。然细究之, 亦并非全无可商之处。如二家均十分重视道咸之后内忧外患所给予学术发展的影响, 强调道咸以降学者因“逆睹世变”, 受到社会危机的刺激而由潜心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然而, 清代社会危机之发生并不自道、咸西方列强炮舰东来始, 实则在嘉庆年间即已现出端倪, 如嘉庆初年爆发的遍及川、陕、鄂三省边区的白莲教起义, 即已震动朝野; 由考据之学向经世致用之学的转变亦非道咸之后才发生, 而可上溯至嘉庆年间乃至乾隆中后期<sup>[3]</sup>(第92-101页)<sup>[4]</sup>(第93-104页)<sup>[5]</sup>(第523-550页)。惟道咸之时的经世派多因缘际会, 或为封疆大吏, 如林则徐、贺长龄、陶澍、包世臣等, 得展其经世致用之能; 或为思想巨擘, 如魏源、龚自珍等, 以其社会思想、学问主张而留名青史。而乾嘉之间的经世派学者或长年持筹幕府、甘居幕后, 或局处一州一县, 以学问缘饰吏事, 声名不显; 其所著述也往往限于

一地一事,议论则温柔敦厚,精华内敛,不露锋芒。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长期以来均受到忽视,迄今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然从思想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观之,他们实可视为道咸经世派的先驱。严如璠就是其代表之一。

—

严如璠(1759—1826年),字炳文,号乐园,湖南溆浦人。“生平慕范希文(范仲淹)为人,取先忧后乐意,自号乐园”<sup>[6]</sup>(卷45,陕西按察使司按察使晋赠通奉大夫布政使衔乐园严公墓志铭,第11页)。年少时即以聪敏著称,读书能一目十行。年十三,即就读于岳麓书院,“从学鸿胪寺少卿罗典,究心舆图、兵法、星卜”<sup>[7]</sup>(第165页)。

因为志不在经书制文,严如璠蹉跎场屋经年,直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方以“优行”入贡,被当时的湖南学政张姚成称为经世之才,可当大任。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苗民起义,控制了湘西大片地区,起义势力迅猛发展,清廷大为震惊。乾隆皇帝命云贵总督福康安与湖南巡抚姜晟、湖广总督毕沅会师于辰州。姜晟向学政张姚成寻访幕府人才,张遂举荐严如璠。严如璠乃进入姜氏幕府。他据其平日所学,结合当时形势,向姜晟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苗苗策略,认为当时军务,“其要在急复乾州,由乾进永绥右,与保靖、松桃、镇筸声势相通”;而进攻乾州须经过泸溪,欲顺利通过泸溪,则必须首先取得大小章人的合作。所谓“大小章人”,是当时的另一支少数民族,“名曰仡佬,与苗世仇”。于是,严如璠乃招募能说仡佬语者随同前往,向大小章人开示利害,“挟其酋六人出,推诚与同卧起”。大小章人的尊长深感钦服。翌年,严如璠依靠大小章人的帮助,在河溪营救了被围的两镇清军;而大小章人在此后的战事中也成为清军重要的一支力量,“复平陇,战花园,皆为军锋”。这支部队“于檄大府檄或不受,必得如手书始行”,显示出严氏在大小章人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sup>[8]</sup>(第5页)<sup>[8]</sup>(卷361,严如璠传,第11391页)。

嘉庆初年,川、陕、鄂三省边区的白莲教起义蓬勃发展。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下诏各省举孝廉方正之士,廷试题目即问以“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严如璠在廷试时对策近万言。他认为:数年以来之所以清剿无功,原因之一是由于事权不一,川、陕、楚各省各自为战,而“贼倚山谷为窟穴,以劫掠为糗粮。湖(北)攻急则溃入陕(西),陕攻急则入川,川、湖、陕合攻则溃入陇(甘肃)、入洛(河南)。”他建议将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山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军事行政区,“专设总理大员”,专门负责清剿事宜,以统一事权<sup>[9]</sup>(第324页)。但“贼势”得不到真正遏制的根本原因,却是由于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何由弭?”因此,严如璠主张仿行古屯田之法,“举流兵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立堡垒,给器械,俾自为耕战守御”。如此,则“计可养胜兵数十万。荒马乱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可为百世长久之策<sup>[8]</sup>(第11391页)<sup>[9]</sup>(第324页)。策上,嘉庆皇帝亲定为第一名,将他的奏疏交川、陕、楚各省督抚大吏采择。虽然三省边区独辟一区与屯田之议均未能实施,但严如璠所提出的坚壁清野之计却得到采纳。

嘉庆六年(1801年),严如璠被任为陕西洵阳县知县。洵阳县地处万山之中,“与湖北之郧西、竹山、竹溪,陕西之白河、镇安、安康、平利相斗入,官兵追贼急,往来折窜皆道洵”<sup>[9]</sup>(第325页),是当时官兵与起义军争夺的交通要道,所以县境屡受残破。严如璠倡导百姓修筑堡垒,组织编练团勇;遭遇起义军则避其锋芒,“专截其尾,扰其顿”,坚壁清野,使起义军在洵阳境内无法停留。嘉庆八年,严如璠遂被任命为定远厅同知。定远厅亦处深山之中,地方辽阔,而诸事草创。严如璠到任后,创修新厅城,又在黎坝、渔渡坝两处修筑石城,使三城互成犄角之势。嘉庆十三年(1808年),严如璠出任汉中知府。时当久乱之后,民困兵骄,散勇逸匪,横行乡里。严如璠一方面整顿营伍,立保甲,治堡垒,恢复地方治安;一方面巡视各地,问民疾苦,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他先后主持修复了褒城县山河堰及城固县五门、杨镇二堰,“各灌田数万市”,此外,还修复或新建小堰百余处。一时之间,汉中水利大兴,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

条件。同时严如璠修复汉中文书院，与两个儿子在书院讲授，其夫人也亲自教百姓纺棉，使得百姓人心帖服，令行禁止，南山地区得以安定。

魏源《陕西按察使赠布政使严公神道碑铭》说严如璠“勤字下，拙事上”，不善于巴结上司，所以仕途不顺。他于嘉庆十三年任汉中知府，10余年不迁，直到道光元年（1820年），才擢升为陕甘兵备道。适逢朝廷诏议川、陕、鄂三省边防建设事宜，严如璠被委任察勘三省边区，足迹踏遍秦岭巴山。经过细致考察，严如璠提出析官移治、增营改汛方案，建议增设城口、白河、砖坪、太平、佛坪五厅，获得批准实施。道光三年（1823年），因其任事以来，治民有方，地方安靖，授以按察使衔。当时的陕西巡抚卢坤对严如璠十分推重，“檄勘全秦水利，于沔、泾、渭诸川，郑白、龙首诸渠，规画俱备。社仓、义学，亦以次推行”<sup>[8]</sup>（第11392页）。道光五年，升任贵州按察使，未到任。道光六年，仍调充陕西按察使，到任不几日即病逝。

## 二

严如璠一生沉于下僚，官不过三品，事功之要者则不出南山（秦岭）一地，其在当世之声名亦不显，可谓默默无闻。《清史稿·严如璠传》论曰：“如璠自为县令至臬司，皆出特擢。在汉中十余年不调，得成其镇抚南山之功。宣宗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将大用，已不及待。为人性豪迈，去边幅，泊荣利，视之如田夫野老。于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措施略见所著书。尝佐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又有《三省边防备览》，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汉中府志》及《乐园诗文集》。”严氏之事功与规划策略，在当日即非荦荦彰著，今日视之，更如过眼云烟；而至其今日尚得被提起者，则正在其著述也。

### （一）以经世致用为著述之主旨

严氏之著述，诚如《清史稿》所云，皆因事而起，亦皆有明确之用途，故其著述之意旨十分清楚，即经世致用，有裨于世事。他在《苗防备览》“引”中自叙其旨在“使后之苗疆者，得有稽考，用备采择”。其《洋防辑要》主要是辑录《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及明中后期防倭诸将之言论，以供当时办理洋防者作为参考借鉴。在“引”文中，严如璠也明确谈到撰写是书的目的乃在于经世致用：“夫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明自嘉靖以降，陵夷不可言矣。当信国公沿海设立卫所之初，弃昌国、浯屿、澎湖、南澳各要不守，论者已有撤我藩篱貽寇巢窟之憾。迨后纲纪日弛，卫所虚存。内地奸民勾结倭夷，乘间发难。东南滨海数千里，生灵涂炭。一时名臣宿将，群策群力，经营数十年。会倭饱思归，直、海受饵，吴越烽烟浸熄。而闽广洋患，旋扑旋生，蔓延而不已。失要则乱，诘不信欤？嘉靖用兵时，唐顺之、茅坤、谭纶、胡世宁诸名人，身在行间，目击失事之端委，屢条防堵之机宜。其他吴越先哲，就所见闻，存之记载，皆得失之林也。……《书》曰：‘鉴于成宪，其罔有愆。沿海文武士民，恪遵经制，无敢废坠，则亿万年享安之福也。’”在《三省边防备览》“引”文中，严氏更自言其著书之目的是为安定边疆助一臂之力。可以说，严氏一生之著述，都是围绕着经世致用这一大目标的。

学以致用，在今人看来，乃理所当然；然在严如璠所处的时代，信奉此种观念，并禀此理念著书立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乾隆年间，虽然也有戴震、章学诚等经世意识强烈的学者，但他们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受到冷落；而大多数学者穷尽毕生精力，“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sup>[10]</sup>（序，第1页），专注于辑佚、辨伪。钱大昕说，“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sup>[11]</sup>（第1页），表现了乾嘉学者对“通经致用”的原则保留态度。在这种学术与社会环境中，严如璠跳出乾嘉考据学的窠臼，致力于致用之学，务使其所学所治有益于世，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二）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以史为鉴，本是中国传统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之一。清初顾、黄、王诸大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然因受内外原因之影响，乾嘉学者多不治史学，间有及之者，亦仅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误，“以经学

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sup>[2]</sup>(第50页)。不仅如此,乾嘉学者大多鄙视史论,认为不应有史事横发议论,更不应结合今事,借古以讽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于此点阐发甚明:“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绩之实,俾年轻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也就是说,治史者不能对史事加以评论,也不能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只能辨析史料之真伪,条理史事之先后、政区之沿革,否则,即为逸出“朴学”之正统规范也。

严如璠之治史,却正与此种所谓“正统派”学风大异其趣。其读史治学之目的既然在于“经世致用”,就必然要对历代有关史事之是非、政策策略之得失、用人之当否大发议论,并结合有关时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三省边防备览》中,严如璠即专辟“史论”一门,综合《禹贡》以来历代文献记载,对历代在山内用兵情况、道路险要进行评说,分析得失,其中颇多可称为真知灼见者。

正是在熟悉历史、纵论历史的基础上,严如璠才得以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三省边区问题的方案与策略。在这些策略、方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的影子。例如:他关于在三省边区单独设立一个军事行政区的建议,就是受到古梁州及唐代山南西道、宋代利州路的启发而提出来的。在《三省边防备览》“策略”门中,严如璠指出:“汉中府治东有饶风,南横大巴,北扼大散,西拒仇池,汉江横贯其中,最为形胜,其中南郑、城固、洋县、西乡、褒城、沔县,周围五六百里,一望平原,地美人殷。汉高因之成帝业,而武侯北定中原,亦屯军于此。晋宋以后为梁州,唐更名兴元。王阮亭咏之曰:‘平芜蹀躞连钱马,近郭参差橘柚村’,非虚语也。”<sup>[12]</sup>(卷11,策略,第3页)汉中地区在历史上政治军事乃至经济地位之重要,正是它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成为一个一级政区中心的原因。

在山区分置厅、县之策,则是明代成化年间原杰方案的发展。严氏在《策略》卷中多次提到明代原杰为安定荆襄流民而分县治的方案:“原杰集三省按、抚会议,将流民编成户口,分设县治,妙选贤能,勤加抚治,三省边境藉义安者百数十年,原之功德远矣。”<sup>[12]</sup>(卷11,策略,第14页)“原杰于郧阳奉设巡抚,将山内州县辽阔者分设县治,洵安边大猷也,惜其所筹办者,只为秦、豫、楚三省交连之处,未谋及秦、蜀上游也。山之在楚、豫者,虽亦高大,而不如秦蜀之险峨,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东北郡邑之边秦者,距成都往往千数百里,视郧阳之距武昌更迢遥矣。县治过大,难以兼顾,如太平之城口、洋县之华阳、安康之砖坪、平利之镇坪者,此类尚多,当时并未议及。岂今昔情形不同,固有待于后人乎?”<sup>[13]</sup>(卷11,策略,第30页)通过对原杰设县方案的分析,严氏提出:“于适中之处设重臣,以一其事权;辽阔之处分州县,以专其治理,绥靖之大规不外此矣。”<sup>[12]</sup>(卷11,策略,第41页)

在三省边区实行屯田之议,虽然是受到古屯政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又有符合当时当地之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严如璠说:“屯政虽系古法,然有实心任事之人不避劳险,安在不可举行?即如新疆、苗疆各屯,现在均著有成效。山内有水田之处难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为子孙之计,亦畏有贼匪之害。核其田为屯田,编其人为屯丁,即以现有之田定为口分世业,设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团聚之,寸土颗粒,官无利焉。再为清出叛产绝业,收其租课,以供屯务之杂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愷切开导,使山民晓然,知此事之为己,如此则屯政可行。”<sup>[12]</sup>(卷11,策略,第41页)虽然此议在当时并未能全面实施,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可行之策。

### (三)以輿地之学为经世之具

輿地之学的治世作用为世人所公认,明末清初的许多思想家多以輿地之学为经世之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之经世目的均十分明确。然此后之乾嘉学者,亦多偏于考古一途,重古地理之考究,而轻当世山川地理之探索。严如璠对二顾尤为推崇,认为“宁人、景范两顾先生,当胜国未造,视洋患为切肤灾,目时艰,忧深虑远;而生长吴越文献之邦,野史、家集、郡邑志乘,足以供其采撷考订。景范之学长于輿地,宁人之识兼通方略,其中叹而发之议论往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较之诸

家尤精”<sup>[13]</sup>（第2页）。严氏于二顾景仰之情于此可见一斑。而其所著之《洋防辑要》中的内容更多是辑《读史方舆纪要》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二书。可以说，严如璠《洋防辑要》、《苗防备览》及《三省边防备览》诸舆地书的著述，在立意、体例等方面都受到二顾的深刻影响。当然，《洋防辑要》、《苗防备览》均为一地一事之书，而《三省边防备览》则最可见出严氏舆地之学的成就及其主旨所在。

《三省边防备览》所谓之“三省”，指川、陕、鄂；三省之边区，即今之川、渝北部、陕南与鄂西北山地，亦即自然地理上所称的“秦巴山地”，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清代陕西的汉中府、兴安府、商州，四川的保宁府、绥定府、夔州，湖北的郧阳府、宜昌府。自古以来舆地之书，所记范围或为全国，或为一省、一府、一县、一镇乃至一山、一水、一寺，记载范围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跨越三数省者，几未得见。应当说，这是严氏的一个创举。

大凡舆地之书，虽皆有其撰述主旨，但大多包罗众多，成为一地历史、地理之总汇，严氏之书却专述三省之边防事宜，选取记载事项专以与边防有关者为标准。全书共14卷，分为舆图、道路、水道、险要、民食、山货、军制、策略、史论、艺文10门，皆紧扣三省边区防务之主题。“道路”门分上、下两卷，以县为单位，详细记载了各县到邻县的陆路交通，其中有详细的里数、所经地点以及道路的状况。中国古代交通至明清时期已发展到了顶峰，然今见文献中有关当时交通的记载仅限于一些纵贯全国的大道，而对于内地区域间的交通特别是山区的交通道路则多不着意，而山区的交通道路，实是当时经略三省边区最亟须了解的情况——行军打仗、巡视地方，无不需熟知山内道路。因此，严氏所列此门，在当时有至关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今日观之，仍然对严氏所了解的山内交通道路之细密程度深感惊异。特别是对山间小路的记载，若非有长年深入的观察了解，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只有当地百姓才能理清的道路的。

“险要”门也分为两卷，分述各府县之险要之处，记载险要周围的地形、地貌，经险要所到之处，以及驻守情况等等。例如：平利县竹叶关“在光顶山北，曾家坝南，川楚往来经由平利者，多取径于此。东至撰河塘六十里，竹溪县一百八十里，东北至平利县二百一十里，牛头店四十里，西至镇坪一百五十里，南至唐家坪五十里，山径崎岖，四处相通，最要关隘，边徼有事为两省必守之险”<sup>[12]</sup>（卷6，险要，第5页）。此外，在“策略”门中，也颇多涉及各地险要者。显然，这些内容都有很高的军事实用价值。至于“军制”、“策略”诸门，更是与当时三省边区的军事与地方治安有着直接关系。

而《三省边防备览》在体例上最具创造性、也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民食”与“山货”二门。此前的舆地书，对于地方政区沿革、军事行动、地方治安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情况，颇为着意，多有记载（虽然详略不同），然于地方经济情形、民生疾苦，则十分忽视，间有记载，也仅局限在户口、赋税、物产等几个方面，且所记非常简略。严如璠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却开辟了这两门，专门记载三省边区的水利之兴修、农作物种植、山民食物结构、山内的物产、木厂、盐厂、铁厂、纸厂等情况。初看起来，这与“边防”无关。但在严氏看来，这却是解决三省边区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三省边区之所以变乱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山内人民生活困苦无依，“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只有解决了山内人民又特别是流民的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平定三省边区的变乱并保持长期的稳定。因此，设置“民食”与“山货”两门的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了舆地书的一种新体例，更重要的则在于提供了三省边区社会经济情况的基本认识，对于当时的当政者制定政策与策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四）关心民生疾苦，探求解决之道

中国古代士大夫低吟“民生之多艰”、高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比比皆是，然真正在理念与感情上都心系百姓、体察民生疾苦、为百姓分忧者，其实并不多见。我们很难说严如璠就是这样的人，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对于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形有着充分且基本合乎实际的了解，并且在不断地思考、寻求着解决民生困苦的办法。这在《三省边防备览》中也有相当多的反映。如：嘉庆年间三省边区之所以频生变乱的直接原因（至少在表面上）是流民的大量进入。《三省边防备览》中有大量材料可反映出当时川、陕、鄂三省边界的人口来源及组成情况。关于流民背井离乡、不远千里来到生存条件相当恶劣山区的原因，严如璠明确地指出，是由于生活所迫，“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田川禁田有歉收处

所,穷民就食前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垦,络绎不绝。”<sup>[12]</sup>(卷14,艺文·兴安升府疏,第3页)

流民进入山区之初,生活大多困苦无依,“山民糲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同时,流民在山区筚路蓝缕、开垦山林,备极艰辛。“流民入山者……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sup>[12]</sup>(卷11,策略,第19-20页)。

流民落籍后,与业主(客户与主户)之间亦多生矛盾,且常受压迫。“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虎祸尤多。土著人少,所种者十分一二;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辄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客租只认招主,并不知地主为谁。地主不能抗争,间有控诉到案,则中间七八转之,招主受佃户顶银,往往积至数百金;断地归原主,则客民以荒山开成熟地,费有工本,而顶银当照据转给,中间贫富不齐,原主无力代赔,则亦听其限年再耕而已”<sup>[12]</sup>(卷11,策略,第18-19页)。

然则,如何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呢?严如煜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其要者大约有三端:一曰兴水利。对于每县的水利状况如何及其对作物的影响,严氏均有详细记载,其目的显然是试图通过对水利的记载及其发挥的作用而使山内人民更加重视水利。如“南郑与褒城共水利者:在汉江南,又有廉水河之流珠堰、柳堰等七堰,南、褒之田此带最为肥饶;又引汉山沟水灌田,有石门、小石各堰;引梁山沟水灌田,有石子湃各堰。其在汉江北,天台山下引沟水作大池蓄水,有南江、顺池、黄道、白杨等八池,大者宽数十丈,长二三里,灌田各数百亩数千亩不等。盖自酈侯创始,民知堰渠之利,蓄洩之方,故处处皆兴水利以供军糈,以足民食。信乎仁人之功,其利溥哉”<sup>[12]</sup>(卷8,民食,第2-3页)!

二曰办“工厂”。严氏提出应利用山内的各种自资源,开办各类厂,以改善山民的生活状况。他指出:“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凡开厂之商必有贖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本利,其贖值帖然为用。……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添数十万无业流民,难保其不附从为乱,故只当听其经营,不可扰也。”山内“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造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山内险阻,老林之虬干螭枝,固为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则丛竹之为患更烈,竹筠常青,春烧不然,得多有纸厂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sup>[12]</sup>(卷11,策略,第20-21页)。

三曰营“副业”。以包谷养猪,“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猪至市集盈千累万,船运至襄阳、汉口售之,亦山中大大贸易”<sup>[12]</sup>(卷8,民食,第13-14页)。他提到在山内种植药材:“药材之地道行远者为厚朴、黄连两种。老林久辟,厚朴、黄连之野生者绝少。厚朴树则系栽成,于小坡平坝中,有笔筒厚朴,言其小也。树至数十年数十年,如杯如碗,则好厚朴矣。黄连于既辟老林山凹山沟中栽种,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经十年方成”<sup>[12]</sup>(卷9,山货,第15页)。

总之,严如煜在嘉庆年间考据学仍然占据学术思想界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率先提出“学以致用”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以其事功与著述实践着这一理念。他在著述与施政实践中,均充分发挥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并以舆地之学作为经世之具,所著《三省边防备览》等著作不仅在舆地书体例上有所创新,而且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与自己的实地考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策略方法;他关心民生疾苦,不断探求解决民生困苦之道,虽然受到时代与知识的局限,且所提出的方法未必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但却显示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因此,我们认为,严如煜是道咸经世实学的先锋,是陶澍、包世臣、林则徐乃至魏源、龚自珍、曾国藩、左宗棠等道咸同间名臣与大思想家们的前驱。

### 三

然则,严如煜以出身于偏僻湘西之一介寒儒,何以得膺此殊荣?换言之,严氏为何能够当乾嘉之学

大盛之时,一反正统派之学风,而率先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且身体力行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考据之学极一时之盛、经世精神暗弱不彰的乾隆时期,经世思想也并非完全断绝,而是不绝如缕,一线续存。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当首推章学诚。他特别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认为治史旨在经世:“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得言史学也。”<sup>[14]</sup>(第524页)与章学诚同时且为至交的汪辉祖也主张为学应有有益于治世。他说:“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勿谓一官一邑,不足见其真学问也。”<sup>[15]</sup>(卷下,第16页)因此,严如煜的经世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始终未断绝的中国士大夫之经世传统的一种体现。当然,由于受到当时传播条件的限制,严如煜实际是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而体察到经世实学之重要性并付诸实践的,很难说他是受到章实斋、汪辉祖之学说的影响。

其次,乾隆晚期至于嘉庆初年,清王朝已呈“盛极而衰”之象,吏治腐败,财政亏空,阶级矛盾渐趋于激化。“文恬武嬉之即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sup>[2]</sup>(第64页)。虽未可言大厦将倾,却已开始摇晃、出现裂痕。严如煜虽身处内地,却因为各种机缘,最先感受到此种桐叶之凋的瑟瑟秋风。他甫出游幕,即身历湘黔苗变,目睹清军将帅不和,军纪废弛,斗志衰颓;而汉苗矛盾尖锐,冲突不断,百姓负担日重,度日维艰。紧接着他又持筹粤督那彦成幕,得直接参与沿海事变,已预感到海疆之将多事。至其久仕南山,更深知民生多艰,而官场黑暗,事已难为。嘉庆年间,海内尚称晏安,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还是太平盛世,完全可以埋首经籍,赏玩彝器,流连山水;或者竞技场屋,驰骋仕途,招权纳贿。但对于身历苗变、“教乱”(白莲教起义)的严如煜来说,事情却已全不是如此。因此,我们说严如煜的经世思想乃时势之产物,此“时势”,非惟当时之客观形势,更主要的是指严氏所感知之“时势”也。

第三,严如煜生当考据学最盛之时,却非专于考据,而走入经世之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其家乡湖南的本土文化——湖湘学派为其经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养料。众所周知,形成于宋代的湖湘学派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讲求经世致用,提倡体用统一,强调实践的作用。严如煜求学于湖湘文化的中心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湖湘学派的正规教育,耳濡目染,自然深受湖湘学派求实之风的影响。严如煜求学岳麓书院时的山长罗典虽为经学大师,“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多有心得”<sup>[16]</sup>(卷11,二罗列传),但并不主张将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教学讲求“坚定德性,明习实务”,将道德教育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罗典自己对舆地之学也深有研究,严如煜即从其学习舆图、兵法与星卜之术,对他后来专心于舆地、策略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四,治清代考据学,需要大量的图书资料,甚至需要收集钟鼎彝器;还需要游历四方,广交硕学鸿儒,相互切磋砥砺,交流学术信息。而这一切,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为基础,非寒士所能有;又要有较好的交通条件和文化氛围,偏僻之区很难具备。清代考据学大师多出于江南两浙,非为无因。严如煜的家乡僻处湘西一隅,虽负笈长沙,但文化环境与经济发达程度也远不能与江浙相比。其家世如何,虽不能详知,但其祖、父皆为布衣(后录如煜之功而赠官),即使丰于资财,也仅为一乡里富户,绝非诗书世家。换言之,严如煜之家世与所处之环境,也不具备从事考据之学的条件。这也应当是严氏未能从事考据之学、而专事经世之学的个人原因。

总之,严如煜之成为道咸经世实学的先驱,既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条件、际遇方面的原因。而作为经世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严如煜的言行思想,对其同时而稍后的思想学术界特别是湖南思想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严如煜与当时的一些湖湘学者或师或友,他们的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中受到严氏影响最大的是陶澍。陶澍的父亲早年与严如煜同在岳麓书院读书,陶父“暇则举以示澍”,而陶澍则“自恨所处不得与共事”<sup>[6]</sup>(卷40,与严乐园先生书,第1页)。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魏源的叔父魏辅邦曾与严如煜是同窗,而魏源自己又与严之子严正基是同窗挚友,并同参与过两江总督陆建瀛的幕

府。魏源曾代萧山汤相国为严如煜作墓志铭。这些不同寻常的关系,显示出他们在思想上有直接间的联系。而魏、陶二人特别是陶澍对于咸同时期的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又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严如煜通过魏、陶间接地促成了道咸以后经世实学的大兴。

### [参 考 文 献]

- [1] 王国维.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A]. 王国维遗书:第 4 册[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2]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3] 黄爱平. 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J]. 中国哲学史,1997,(4).
- [4] 黄爱平. 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J]. 清史研究,1997,(2).
- [5] 陆宝千. 嘉道史学——从考据到经世[A].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 期[C]. 台北:中央研究院,1973.
- [6] 陶 澍. 陶文毅公全集[M]. 海州:淮北士民公刊本,道光二十年(1840).
- [7] 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传[M]. 北京:中国书店,1987.
- [8]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9] 魏 源. 魏源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0]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洞泾草堂藏板,乾隆五十二年(1787).
- [11] 钱大昕. 二十二史考异[A]. 赵 翼. 廿二史札记[M]. 北京:中国书店,1987.
- [12]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M]. 道光二年(1822).
- [13] 严如煜. 洋防辑要[M]. 安康:来鹿堂藏板,道光十八年(1838).
- [14]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5] 汪辉祖. 学治臆说[M]. 南京:江苏书局《龙庄遗书》本,光绪十五年(1889).
- [16] 陈嘉瑜,王闿运. 湘潭县志[M]. 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Yan Ru-yi: Pioneer of School of Practical Thought

LU Xi-qi, LUO Du-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U Xi-qi (1965-),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reg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UO Du-fang (1976-), female,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reg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bstract:**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w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when some officials and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ir own plans and propositions aimed at re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s, while the textual research predominated over the realm of thinking and academic. But these scholars who were the pioneers of school of practical thought were overlooked at that time. Yan Ruyi was one of them. 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lower strata of society and made good use of history to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s. His practical thought did deeply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and later scholars, such as Weiyuan, Taodun.

**Key words:** YAN Ru-yi; practical thought; pioneer